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党史资料

第二十八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坤仪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广东党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西湖路 51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53,000 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18-02131-x/k · 483

定价：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回 忆 录

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上）	杨应彬（1）
香港三年地下工作回忆	杨康华（113）
在香港从事粤剧界统战工作琐忆	陈残云（142）
粤赣湘边纵队机要通讯概况	丘海生（146）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专题史料

华南号角 —— 回忆《新华南》	谭天度（163）
纪新中国剧社	胡希明（167）
叶挺将军组建的东路游击总指挥部	邹金城（171）
在烽火纷飞的年代 —— 记中山人民抗日武装	黄敬潮（174）
日寇血洗三灶暴行纪实	何志毅（180）
惨绝人寰的下壆村百人坑惨案	李春水（187）
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综述	黄穗生（194）
梅县革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何 明（230）
东江纵队的抗战文化工作	王艳芳（235）

党 史 研 究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演达对中国农民

问题的理论贡献	陈登贵（250）
华南抗战与中共的军事统战工作	叶文益（261）
中国共产党与战后香港进步文化阵地（上）	袁小伦（274）

广东省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黄家合 (301)
粤西渔区的民主改革	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313)

党 史 人 物

杜埃	何展琼 刘 寒 黄瑞金 (322)
涂锡鹏传略	何群新 (329)
黎孟持传	张 杰 (337)
曾伟烈士传	江 平 (350)

来 函 照 登

致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的信	邓 杰 (362)
----------------------	-----------

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上）

杨应彬

今年——199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50 周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 50 周年，是中国红军到达陕北的 60 周年。在这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想起今年也是我参加革命的 60 周年，和黎亚共同战斗的 57 年，婚后共同生活的 50 周年。过去彼此忙于战斗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回顾往事。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顾一下过去是很有意思的。60 年在人类长河中是一瞬间，对个人说来则是漫长的岁月。我们经历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尽管是沧海之一粟，但也是这个大海中的一滴水，可以看到时代的光辉。出于这种动机，就由我慢慢回忆，由黎亚记录下来，成了这篇回忆录。

一、从小就卷入革命洪流之中

每一个参加革命的人，都有着他参加革命的必然原因，但是他如何同革命队伍发生关系的，却常常通过许多偶然的机遇。1935 年 9 月我第二次去上海，住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陶行知先生住处。当时认识了一位同志叫做王东方，他比我只大三四岁。我们一见如故，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话，从家庭出身谈到

世界大势，从理论学习谈到革命斗争。当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东方同志在我住地借宿，两个人抵足而眠，又谈到半夜。第二天一早，他走了，我却在枕头底下发现几本油印得非常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显眼地印着红色的锤子与镰刀的徽记。里面的字每一笔只有头发丝粗，每一个只有绿豆般大，可是一行行、一个个都十分秀丽，雪白的纸上没有半点墨污。哎呀！这是秘密文件呀！我看不该看呢？迟疑了一下，我还是看了。里面说的全是有关参加组织的问题，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又是兴奋，又像是偷偷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样感到内疚。晚上东方同志又来了，却装着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样平静，他显然在等待着我先讲话。我一鼓作气把两种心情同时告诉他。向他认错，因为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看了文件；又向他提出要求，我要参加组织。他满意地笑了，说：“文件是特意留给你看的。参加组织，我们热烈欢迎。”就这样，我参加了左翼教联（当时叫“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秘密的群众组织，主要吸收学校的进步师生参加。

我参加左翼教联后，被分配到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工作。这是一所革命学校，是党在农村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团长是张劲夫同志，是地下党员。“左翼教联”、“中青”都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先后有林一心、王东方、张健、侣朋、许鲁家（鲁藜）、张家桢、刘水居、龚士其、杨一德、张恒、胡晓峰、张轨、戴季康、吴立奇、周瑞锦、陈光宇等人。工作对象一部分是农友，一部分是农村的失学儿童。我主要负责儿童工作，给他们上政治课、识字课、教唱歌等。我们是半工半读性质的，经费主要靠陶行知先生募捐得来。工学团经常请一些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演讲，如钱亦石、邹韬奋、钱俊瑞、薛暮桥等人。冼星海也常来教唱歌。

1936年春的一天，东方同志给我传达：“目前形势有变化，需

要团结发动更多的人进行救亡图存的工作，左翼教联这个组织形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自动解散，参加教联的有一部分人将吸收入党。”东方说，我是被吸收入党的，要我写一份自传。我听后内心非常兴奋和激动，当晚就在一个小阁楼上，点着油灯写好了。第二天交给东方。不久东方同志告诉我：“批准了。”这种欢乐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因为在我心目中共产党员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难忘的 1936 年 6 月 19 日，就是这一天，我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介绍我入党的是王洞若和王东方，那天没有来。上级党组织派张敬人同志来监督（后来我才知道，张是“教联”党团书记）。和我一起宣誓的还有许鲁家、张家械同志。我们四个人在山海附近的石角坟村我和许鲁家住的一间小房子里向党宣誓。当时不可能挂红旗，但是我们必须有红旗。张敬人同志熟练地在一张红色的香烟纸上画上一面旗子，旗上写着 C. P. C. 并且解释说 C. P. C 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们就对着这面红旗宣誓了。当时已经是“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但是敌人对革命运动的镇压仍然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防止意外，宣誓完毕，我们就将画在纸上的红旗烧掉了。但是红旗却永远在我的心头生根了。党的思想上的红旗永远引导着我们前进。

小小年纪参加革命队伍，这在红军中是不足为奇的。在红军里有不少红小鬼，普遍的原因是家里穷，受革命影响早。回想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境遇。

我是广东大埔百侯南乡人。1921 年 10 月 20 日出生。母亲生我的时候已是第三胎了。第二胎没有养活，是害了破伤风死的。当我还在月子里，又得了“锁子鬼”（破伤风），牙关紧闭，奄奄一息。母亲流着眼泪准备把我丢在畚箕里，但又舍不得，重又抱

起来，希望能把我救活。旧社会说，我命大。真的，在母亲的怀抱里又活起来了。

那时母亲是靠挑担过日子的，一天不挑就没有钱买米下锅。父亲做小买卖，赚不到什么钱。母亲是在她出世三个月的时候卖到杨家当童养媳的。祖父死得很早，祖母养不活一家，就改嫁了。父母就靠着嫁祖母的钱与曾祖母相依为命过日子。谁知当我的大姐才5岁时，曾祖母又因贫病交迫上吊死了。没有钱埋葬，只好卖了大姐来埋葬她。这种凄凉的日子母亲讲起来都要流眼泪。母亲很爱我，小时候背在她背上，给我唱儿歌，给我讲故事，讲些穷人受苦受难的故事。因此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就深深刻下了穷人受苦的烙印。

当我七八岁刚懂事的时候，大约1929年夏，活动在闽粤赣边的一支红军地方主力挺进到我的家乡，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不少新鲜东西。有一天早晨，不知道为什么我起得特别早。朝雾刚刚散去，远山苍翠欲滴，乡村分外安谧，这是一场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因为残余的白军逃过河去了，红军还没有进村。一会儿，一轮红日从东山顶上冉冉上升，霞光万道，立即照红了半边天。就在这个时候，一枝红旗在日边渐渐升起，先见矛头，再见大旗，最后一小队人马从山背后登上山顶。“来啦！”全村沸腾起一阵欢呼，红军进村了。

红军进村后可热闹了，他们做了许多大事，我当时理解不了，但是我学会了几首山歌，跟着大伙儿唱：“日头一出满天光，穷人都爱共产党”；认识了写在门口祠堂墙壁上一个字就有一人多高的大标语：“国民党就是刮民獠”，“没收土豪田地分配给贫民”；还从一些积极分子口中听到很中听的两句：“太阳瓦面过，富贵轮流做”。过了三天，红军处决了当地反动民团的团董和几个反革命分

子后开拔了。但这支红军，这面红旗，这些山歌，这些标语，这些热烈的斗争场面却永远在我心头留下来了，埋下了后来参加革命的种子。

家穷，红军的影响，这都是在儿童时期受的社会教育，而较系统较深刻的教育，应该说是在百侯中学学习的那段时间。小学毕业后，升中学谈何容易，我妈妈准备送我去学裁缝。恰好这时陶行知先生派了一批进步老师来复办百侯中学。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杨焕楣（杨震同志）报了名，他和我很要好，三番四次到我家来，动员我去报名。正好那时妈妈挑担到高陂去了，我便把自己养的四只小鸡卖了1元2角，拿1元钱去报了名。妈妈回来后知道这件事，流着眼泪说：“你投错了胎，怎么出生在穷人家里呀！”后来妈妈卖了一头小猪，借了钱让我读了半年。以后，学校知道此事，让我们几个穷学生免交学费，老师还捐钱买书送给我们，我们又勤工俭学，为学校挑水，干点杂活，赚点钱买点文具。就这样我读到初三上学期。真是艰难呀！

但我很幸运，我们的老师很好，特别是班主任程今吾老师（文革前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不但给我们传授文化知识，还采用启发式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他把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等进步书文选作补充读物，还介绍我们看进步书籍如《毁灭》、《铁流》、《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等。一时间我们这班初中生都争先阅读这些大部头，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眼界大大开阔了。学校还鼓励学生进行课外活动，晚上办夜校，给成人扫盲。提倡讲普通话，举行演讲比赛。出墙报，记日记，演话剧。我和杨焕楣还一起演了一出《凤阳花鼓》。我们那个班有40多人。到现在还有来往的有：杨焕楣、刘兆伦、杨培新、杨治明、杨旋、杨启元、杨淑珍、肖练石，还有

不同班的张力克、张伟烈、肖施培、杨琴、杨萍、杨维黑等。60多年了，真不容易呀！他们现在都已离休。过去几十年在党的领导下，在各条战线上都做出了贡献。

1934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一位老师去了上海。当时我只穿一件背心，一条裤衩，带了一支自来水笔和几十张过期的日历纸（准备写日记用的），打赤脚走了50里山路到高陂，然后经潮州、汕头到了上海。在汕头到上海的船上遇到台风，差点喂了海鱼。这次去上海真是大开眼界，对上海的殖民地租界的本质有了粗浅的了解，在日记里流露了自己强烈的愤慨和不满。更幸运的是我认识了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知道这个情况后，要我把这些日记拿到儿童书局去出版，取名《小先生的游记》，还为这本书题了封面。我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不满13周岁的少年居然出了一本书，解放前再版了12次，因为里面提到阶级对立，还一度被国民党列为禁书。

这次去上海，还认识了王洞若老师，可以说他是我入党的启蒙人。那年的“八·一”，上海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第二天王洞若老师把我找去，给我看传单并和我谈了话。传单的主要内容是：反蒋、反内战、反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和我贫苦的出身和侯中所受的教育紧密结合着，所以很容易接受，很受鼓舞。第二年很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次谈话和传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这次去上海受到启发和教育，回到家乡后便呆不住了，总想到外面去追求进步，寻找革命。1935年春天，程今吾老师从南宁来信说，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正筹办师范班，可以到那里免费学习。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就和张力克、肖练石、杨启元、杨楚妙、杨北京、肖文、杨明通结伴去广西南宁当工读生。我们历时半个月行程2000多华里，才到达南宁，学习后派去青山林

场，一边育苗种树，一边自己学习。工资每月5块小洋，我伙食用了3块，剩下2块寄回家去，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半年后，我又去了上海。

就这样我在上海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当时年龄虽小，但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些准备，组织上便吸收了。入党时还不满15岁，也没有后补期。

二、在山海工学团期间难忘的几件事

（一）探索一套教学方法

我在山海工学团一开始任小先生，后任总团儿童部负责人。日常工作就是给儿童们上课。总团儿童班的学生，主要来自夏家宅等农村的孩子，几十个人却是从三年班到六年班都有，很难分班，也很难分科。当时第一位的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要把政治、文化等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就想自己编课本，综合施教。我想了个办法：把一张白报纸分成四开，上面贴些图片，这些图片大多是从进步报刊上剪下来的照片、漫画或地图，再配上诗歌或救亡歌曲，内容都是唤醒人们起来抗日救国的，小孩子很有兴趣。比如有一张图片是讲华北平原上的小孩与一条狗在玩耍的，我编了一首儿歌写在图边说：“你看华北小朋友，玩得多自由，如果当了亡国奴，不如身边那只狗”。孩子们一面看图，一面识字。识了字又教他们唱歌，很高兴。这样学习，进步很快。王洞若老师有一次到学校来，看到这种教学方法，很赞赏。

（二）我在党小组生活中受到的教育

我在山海工学团期间的组织生活是很健全的。和我编在一起

的先后有许鲁家、张家桢、刘鸿文、许翰如、杨一德。王洞若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领导我们，每次小组会他都参加。小组会既成了布置工作的会议，又成了教育我们的课堂。首先，他教我们如何分析形势。对一个共产党员说来，很重要的是要求他能独立工作、独立作战。因此，独立分析形势、独立确定工作方针、独立应付突发事件就成了一个基本要求。1935年秋至1936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是很复杂的：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法西斯佛朗哥在希特勒支持下发动内战；日本法西斯大举入侵华北，我国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由此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国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洞若老师便教我们分析形势。每次小组会的第一个议程就是轮流由一位同志作形势分析，从国际到国内、到上海、到山海周围。然后由他综合发言。他知识广博，往往画龙点睛，在要害问题上几句话便中心突出，思想鲜明，使我们豁然开朗，每过一次小组生活，思想上就有所长进。这是我终身受益、终身难忘的。

（三）参加援绥音乐大会的演出

1935年何（应钦）梅（津美次郎）协定之后，华北危机迅速发展着。到1936年，日本侵略者率领它扶植的傀儡汉奸武装，已经深入到绥远百灵庙（今内蒙古西部）一带，威胁到包头。国民党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并收复了百灵庙。全国人民慷慨激昂，声援绥远抗战，并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5年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却实行镇压抗日的反动政策。1936年冬逮捕了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沈钧儒等“七君子”，并通缉在海外开展爱国运动的陶行知。在这个艰难的形势下，上海音乐界吕骥同志等发起和组织了以业余合唱团所联

系的各歌咏团为中心，并动员有关的口琴队、音专、美专的师生共同参加的演出活动，十分成功地举行了援绥音乐大会。

山海工学团和救亡音乐运动有密切关系，承担了童声小合唱的节目，我和杨一德同志带领山海的小学生前去参加。大会上演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自由神》、《毕业歌》、以及郎毓秀等女声小组唱黄自名作的《山在虚无缥缈间》、盛家伦和蔡绍序的独唱、丁致中的器乐演奏等，把有着各种不同听众的各种流派的音乐家，各种流派的音乐表现形式和风格，都吸引和组织到抗日救亡音乐的洪流中来了，显示了音乐界的空前的团结。大会的场面是很感人的。

山海孩子们的节目安排得很后，原来我担心听众不多了。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听众十分拥挤。偌大一间上海市总商会礼堂，从头到尾水泄不通，以致我只好一直站着听。在演出过程中，台上台下，演员听众之间感情的交流，掌声口号声的汇合，情绪之热烈激昂，就不用说了。到山海的小孩一行八人出场时，因为穿的是贫苦农民孩子特有的旧唐装，穿着布鞋而没有袜子，听众先是愕然，接着一阵掌声。指挥的小女孩张天虹（张恒的小妹、后来的黎冰鸿夫人）出来后又是一阵掌声。当时张天虹还很矮小，从后台拿了个肥皂箱站在上面指挥，此情此景更激起观众一阵热烈掌声。那时还不时兴小孩当指挥，但这些小先生们平日就已习惯“自己的事自己干”，谁说年纪小就不能当指挥？他们唱的一是聂耳的《卖报歌》，一是贺绿汀的《谁说我们年纪小》。当唱到：“万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陈腐的社会，要我们来改造”时，孩子们的歌声和听众们的心声联在一起，掌声更是热烈不断。

这是近 60 年前的事了，但在我心中一直留下很深的记忆。

(四) 秘密阅读文件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印刷文件、散发文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就是阅读文件也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我怎样也忘记不了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时的情景。我在山海工学团时，除给孩子们上课外，还兼图书管理员。但《宣言》是内部文件，是不敢冒险地夹在一般书里的。我们几个同志就在麦地里挖了个洞，埋上个陶土罐子，四周放些防潮石灰，把文件放在罐里，加上盖；然后铺上土，做个记号。我们几个人则轮流放哨，互相掩护别人利用中午或不上课的下午，躲进麦地、躺在沟沟里看上那么三几页。看这本《宣言》我就在沟里躺了十多次。看了一个多月才看完。但是奇怪，在那样的环境中读过的文件，却印象最深、记得最牢，以致其中整段整段火热的诗一般的句子，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可以背诵出来。这一段经历，对我很有教育意义。以后几十年中我阅读文件、起草文件时，往往都怀着深厚的激情。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越来越理解到，革命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

(五) 发展党员

经组织研究决定：在山海工学团内要发展党员，并要事先进行培养。组织决定我培养刘鸿文、杨一德、许翰如三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和教育，他们都入党了。我参加了他们的入党宣誓仪式。还有黎明也是我负责教育的。正要发展她入党时，抗战开始了，各奔东西，这个任务就没有完成。

（六）我第一次学会独立处理问题

在洞若老师谆谆善诱的教导下，我也渐渐学习在工作中、斗争中用脑子。1936年11月间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七君子”后，同时下令通缉在海外的陶行知先生，并搜查山海工学团。搜查时，在我书桌中找到一本我正在看的田原（邓初民）写的《政治学》（那是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的）。搜查人问我：“为什么看这样的书？”我推说：“我是图书管理员，这本书是别人借阅后退还，我还没有上架的”。随即拿出钥匙给他们看。搜查后，他们把我和一位总务主任、一位幼儿园教师一同带往大场公安局问话。三人中唯有我是党员，但年纪小，只有15岁。国民党宝山县党部的人没有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却问：“张劲夫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一听，知道自己没有暴露，便一口咬定我不知道。几小时后，问不出结果，一齐放了出来。第二天傍晚，洞若老师到山海附近的沪太路上找我了解情况，并对我分析这次突然搜查是配合“七君子”事件来的，但也要防止还会再来。又说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安全，准备将我转移到租界里去，问我意见如何？我说，根据他们问话的情况看，并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如果组织上需要党员留下坚持，我倒比较适合。因为国民党已扣押过一次，大不了再来一次，也不会有什么收获。这样，我留下坚持倒是比较安全的。洞若老师大为感动，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坚持下去了。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经受的考验，是我第一次独立处理问题，也是洞若同志所进行的“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在我身上开的花结的果。

（七）喜爱文学、学习写作

入党后，我不但更加喜欢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而且也爱

好文艺作品。爱好也很广泛，什么都想看想写，小说、诗歌、散文、论文等。我当时参加了薛暮桥同志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经常向当时薛暮桥同志在上海主编的《东方杂志》农村调查栏和陶行知先生主编的《生活教育》投稿。我印象较深的是最近从《东方杂志》上找到的一篇，题目是《崩溃中的大埔农村》。内容主要是对大埔的社会各阶层作具体的经济上、生活上、心理上的分析。黎亚看了这篇文章后，很惊奇地说，15岁的少年，怎么会对社会作这样的分析？并问我：“你当时是不是看过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是不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而写的？”我笑着说：“那时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她又说：“为什么你那种分析的笔调和那篇文章这么相似呢？”我说这是一种自发性，因为我家穷，从小就听到穷人受苦的故事，因此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有先天的一致性。其次，入党后王洞若同志又教育我分析形势，因此学习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就慢慢开始养成了习惯。黎亚说：“噢！原来是这样。”在《东方杂志》以及《生活教育》上还发表过好几篇文章，现在有些都找不到了。总之，在“山海”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学写东西，这对我以后有很大帮助。

三、到抗日前线去

“七七”事变不久，“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就打响了。人们十分振奋，情绪非常高涨。当时我正在宝山大场，手捧着为应变而准备的干粮往山海工学团走，在一座小木桥上听到了这第一声炮响。从下午4时起，炮声断断续续一直响到深夜。山海工学团地处火线下，因此团长张劲夫同志和党组织决定将人员分成三起：老弱妇孺立即撤进租界；年轻的、身体好的组成担架队上前